

边陵文集



河北教育出版社

ISBN 7-5434-2950-0



9 787543 429505 >

ISBN 7-5434-2950-0

1 • 314 定价: 228.00 元

【全 10 卷 • 精装】

迦陵文集
一

河北教育出版社

书 名 迦陵文集(1—10 卷)【精装】
作 者 叶嘉莹
责任编辑 王亚民 邓子平
装帧设计 刘 峥
出 版 者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城乡街 44 号)
发 行 者 河北教育出版社发行部
印 刷 者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版 次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33.625
字 数 3198 千字
书 号 ISBN 7-5434-2950-0/I·314
定 价 22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前言

《迦陵文集》哀集叶嘉莹先生中国古典诗词论著、讲录及诗词创作，凡十卷，都三百万言。书名迦陵，取自先生别号。先生早岁读《楞严经》之“迦陵仙音，遍十方界”，以“迦陵”与“嘉莹”声音相似，遂以之为号。盖兴之偶到，虽云巧合；志之所之，非无深意焉。

先生生于燕京旧家，四十年代毕业于辅仁大学国文系，为诗词名家顾随先生入室弟子，五十年代在台湾大学任专任教授，并在淡江与辅仁两大学任兼任教授。六十年代赴美，任密西根州立大学、哈佛大学客座教授，后定居于加拿大之温哥华，任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1989年退休后，当选为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自七十年代末返大陆讲学，先后任南开大学、四川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客座教授，南开大学中国文学比较研究所所长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名誉研究员。自五十年代迄今，执教国内外大学四十余载，治学自成一家，桃李遍及中外。

先生少承家教，旧学根底既深，壮岁旅居海外，复得探究西方文学理论渊源，故能较其异同，取其所长，融会贯通，自成体系。其专著莫不发创新见，独造精微，深为海内外学界所推许，且文笔优美，隐寓诗心，亦为广大古典诗词爱好者所喜爱。

先生之诗清逸英发，其词则少年之作颇有婉约之致，近于北宋之晏欧，中年以后历经世变，其所作乃一变而有苏辛豪宕之气，近年则深研词学，其所作又有近于梦窗碧山之沉郁者，此固非惟才情之广，实亦阅历人间饱经风霜，境界愈趋开阔，思致愈趋深邃故也。

尝有从学诸生问古典诗词之现实功用，先生答曰：“可以使人心不死。”信哉斯言！盖诗之为用，可使心灵不受物欲羁绊而长葆兴发感动之生命力，个性与创造性赖以存焉。先生之说诗不重知识文字而重在传达作者感发生命之本质，其宗旨亦本乎此。

总 序

《迦陵文集》的出版，就我个人而言，实在深感惶愧。因我自己深知这些论讲诗词的文字，原没有什么学术价值，现以文集形式出版，实非我之本意。但如今却终于出版了，这其间实在关系着长达半个世纪以上的一段历史渊源。而在这一段渊源中所牵涉到的师友，都是我所深怀感谢的。所以在此出版之际，我愿把促成此书出版的历史略加叙述。

首先我要谈一谈“迦陵”二字命名的由来。那是1942年的秋天，我当时正在北平辅仁大学国文系二年级从顾师羡季先生修读唐宋诗的课程，因我自幼在家中便已习作旧体诗词，所以便经常写作一些诗词请先生批改，先生对我也时加奖勉。其后有一天先生忽然问起我有没有笔名，说要把我的几篇作品交给报刊去发表，而我一向从来没有发表过任何作品，当然没有什么笔名，仓促间忽然想到先生在讲课时往往引用佛书，而《楞严经》中曾记载云佛国有鸟名迦陵者，与我的名字嘉莹二字的音声颇为相近，于是就选用“迦陵”作为笔名了。关于羡季先生给我的启迪教诲，以及先生对我的期待盼望，我在多年前所写的《纪念我的老师清河

顾随羡季先生》一篇长文中，已有详细叙述，现在就不再重述了。总之，我自1948年春因结婚而离开北京后就与羡季师失去了联系。其后又因外子工作调动而辗转迁徙去了台湾，六十年代中又辗转去了美国，更因种种原因而羁留在了加拿大，直到七十年代中才有机会再返回祖国探亲。当时我的一个最大的愿望，就是想把多年来在艰苦流离中所完成的一点研读和教学的成果，能再次呈缴给老师，得到老师的指正和印可。岂意老师竟已早于1960年9月去世，未能再见老师一面，这实在是我平生最大的悲憾。幸而不久后我就与老师的两位女儿——在北京的之惠师姐，及在保定的之京师妹取得了联系，并一同展开了向师友们搜辑老师遗著的工作。谁知就由于我与之京的联系，竟然就种下了今日出版文集的因缘种子。原来当时之京所任教的河北大学中文系内，还有一位教写作的谢景林先生。谢先生当年也曾听过羡季师讲课，更有一位年辈较长的谢国捷先生当年也曾听过羡季师讲课。当1979年春我第一次到天津南开大学访问讲学时，谢国捷先生就曾旁听过我的讲课，返回保定后就向谢景林先生介绍了我的情况。所以当我于1981年再次回到南开讲课时，谢景林先生就通过了之京的介绍到天津来看望我，不仅旁听了我的课，而且还提出了要写一篇访问记的计划。谢先生的态度极为诚恳认真，访问时记录得非常详尽。后来写成了一篇传记式的长稿，而那时我已返回了加拿大，谢先生还将这篇长稿远寄至加拿大征求我的意见。其后又有一位在唐山大学中文系任教的赵玉林先生，原来也是谢景林先生的同学，偶然见到了谢先生所写的这篇传记稿，而且因为我曾送给之京一册未经正式出版的我的诗词稿，他们二人对这些诗词都极感兴趣，于是就把原来以叙写生平为主的传记稿，又改写成了以诗词贯串为主的另一篇题名为《明月东天》的传记稿。及至1987年春，我在北京国家教委礼堂应一些爱好诗词者的邀请，举行了

一次唐宋词的系列讲座，有一位担任人民日报社所属《报告文学》主编的程光锐先生，既听了我的讲座，又听说有这一篇文稿，就向谢景林先生要去这篇文稿，在他所主编的刊物中发表了。文稿由谢景林与赵玉林二人联署作者之名。赵先生至今与我仍未识面，而谢先生则与我已成为了经常保持联系的友人。九十年代初谢先生自河北大学转来天津，任天津人民出版社总编辑，恰好我又应南开大学之邀，担任了中国文学比较研究所的所长，也常回到天津来，偶然与谢先生见面时，谢先生曾多次表示要在他的任期内把羨季师与我的一些著作出全出好是他的一大愿望。关于羨季师的著作，他已出版了一册《诗文丛论》，由之京编辑收录补足了以前我们早期所辑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顾随文集》中所未收的一批文稿。继之，谢先生就提出了要把我多年来在两岸三地所出版的书都集中在一起出版为一系列的计划。我因此事牵涉问题颇多，所以迟迟未敢应承，但谢先生对此事却极为热心执著。今春二月我赴台港两地讲学后，又一次回到天津。有一天谢先生给我打电话来，说有一位河北教育出版社的社长王亚民先生，也是河北大学校友，多年前当他在河北人民出版社工作时，因为曾从之京及谢先生处见到了我的诗词稿，就想拿去出版。曾托谢先生与我相商，我当时自以为这些诗词稿大多为早期习作，不值得出版，所以未曾同意。如今王先生既听说了谢先生要出版我的系列作品，就商得谢先生的同意，请谢先生转让给他去出版。电话中谢先生曾盛赞王亚民先生在出版事业方面的眼光、理想和气魄，于是我就同意了谢先生可以与王先生一晤，一切见面再谈。果然不久后王先生就来到了天津，并由谢先生陪同到南开来与我相见，而王先生果然如谢先生之所称述，办事极为果断敏捷，当日就与我签了出版合约。而文集有很好质量得之于之京师妹之学生邓子平、张国岚及我的学生安易、徐晓莉等的辛勤编辑和校核。如

今在此即将出书之日，回想一切过程，实在都出于我曾从羨季师受业的一段历史渊源。因决定将此一系列著作集题名为《迦陵文集》，并请之京师妹集录了羨季师的书法以作为扉页题签，既想藉此以表示我对于羨季师的教诲期望之恩的感念不忘，也想藉此表示我对于因羨季师之渊源而促成此文集之出版的友人们的感谢之意。而现在距离羨季师第一次拿我的作品以“迦陵”为笔名去发表的时间，盖已有五十四年之久矣。

以上我既对此一文集之出版的渊源，做了简单的介绍，下面我就将对此一文集之内容也略做说明。此文集暂定十种，计为：1. 杜甫秋兴八首集说，2. 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3. 迦陵论诗丛稿，4. 迦陵论词丛稿，5. 唐宋词名家论稿，6. 清词丛论，7. 古典诗词讲演集，8. 汉魏六朝诗讲录，9. 唐宋词十七讲，10. 我的诗词道路。以上十册书，大约可分为三种不同之性质：第一类是我自己亲笔撰写的有关诗词的论著，本书所收的前六册书都是属于此一类的作品；第二类是在各地讲演及教课的录音整理，第七至第九三册书，是属于此类的作品；第三类是谈我自己从事诗词研究和创作道路的，其中既包括一些书的序跋，又附录有一些学者对我的诗词研究的评述性的文字，第十册是属于此类的作品。不过，以上所言实在只是一种最粗浅的表面的分类，若就每册书之深层性质而言，则虽是同一类的作品，也有着主题与风格方面的种种差别。何况此一系列文集中每册书之写作或讲录的时间与空间又往往相差甚远，则其风格与内容之不尽能贯串一致，自可想见。但就另一方面而言，则我个人又有些基本不变的观念，其在不同之作品中之不免亦有重复的出现，这自然也是可以想见的。关于这些异同之虑，我本应在此对各书之内容与风格更做较详之说明，但因此一系列文集既大多为旧作之组合，而我以前在出版每一册旧作时，也大多已在书前或书后写过序、跋，或前言、后记

一类文字，现在就不再重述了。尚须说明的是，文集中之部分作品曾获得加拿大社会人文科学研究理事会（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Resemrch Council of Canada）之研究补助，特致谢意。此外，我自己诗、词、曲、联语等各类创作的作品，将另外辑成为《迦陵诗词存稿》一册，单独出版。

但最后我却还有几句话要说，就是我是一个曾经历过不少坎坷忧患的人，我平生从来未曾萌生过任何成名成家的念头。我只是一个从幼年时代就对古典诗词产生了热爱，并且把终生都奉献给了古典诗词之研读与教学的工作者。是古典诗词给了我维生的工作能力，更是古典诗词中所蕴含的感发生命与人生智慧，支持我度过了平生种种忧患与挫折。而今在古稀之年以上出版了这一系列文集，可以说只是留下了我所艰辛走过的一片足迹而已。我平生既因为忧患劳苦而未能使我安心治学成为一个较好的学者，又因过重的教学工作也未能使我有从容涵泳的余暇成为一个较好的诗人，我只是一个献身于古典诗词之教学的工作者，而且至今仍在奔走各地的讲课中忙碌着。我的愿望只是想把我自己内心中对古典诗词的热爱作为一点星火，希望能藉此也点燃起其他人，特别是年轻人心中热爱古典诗词的一点星火，相信我国古典诗词中所蕴含的生命与智慧，必将在神州大地上展现出一片璀璨的光华。追念我当年所受之于尊亲师长们的教诲和期望，但愿我所接过来的薪火，不要在我的手中熄灭。以前清代的词学家周济，在其《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的结尾处，曾写过几句话：“由中之诚，岂不或亮，其或不亮，然余诚矣。”我现在也想引用这四句话来作为我这篇序言的一个结束语，以说明我整个文集中各册论著与讲录中的态度与用心，也不过是如此只如此而已。

1996年12月13日写于天津南开大学，时距离津返加之日仅余两天，仓促成篇，故颇为简率，望编者与读者原谅。

论杜甫七律之演进 及其承先后之成就（代序）

一、集大成之时代与集大成之诗人

谈到我国旧诗演进发展的历史，无疑唐代是一个足可称为集大成的时代，只根据《全唐诗》一书来统计，所收的作者，就有二千二百余人之众，而所收的作品，则更有四万八千九百余首之多。在如此众多的作家与作品中，其名家之辈出、风格之多采，自属一种时势所趋的必然之现象。面对如此缤纷绚烂的集大成之唐代诗苑，如果站在主观的观点来欣赏，则摩诘之高妙，太白之俊逸，昌黎之奇崛，义山之窈眇，固然各有其足以令人倾倒赏爱之处，即使降而求之，如郊之寒，如岛之瘦，如卢仝之怪诞，如李贺之诡奇，也都无害其为点缀于大

成之诗苑中的一些奇花异草。然而如果站在客观的观点来评量，想要从这种种缤纷与歧异的风格中，推选出一位足以称为集大成的代表作者，则除杜甫而外，实无足以当之者。杜甫是这一座大成之诗苑中，根深干伟，枝叶纷披，耸拔荫蔽的一株大树，其所垂挂的繁花硕果，足可供人无穷之玩赏，无尽之采撷。

关于杜甫的集大成之成就，早自元微之的《杜甫墓志铭》、宋祁的《新唐书·杜甫传赞》，以及秦淮海的《进论》，便都已对之备致推崇。此外就杜甫之一体、一格、一章、一句而加以赞美评论的诗话，历代的种种记述，更是多到笔不胜书，至于加在杜甫身上的头衔，则早已有“诗圣”与“诗史”的尊称，而近代的一些人，更为他加上了“社会派”与“写实主义”的种种名号。当然，每一种批评或称述，都可能有其可资采择的一得之见，只是，如果征引起来，一则陈陈相因，过于无味；再则繁而不备，反而徒乱人意。我现在只想简单分析一下杜甫之所以能有如此集大成之成就的主要因素，我以为其主要因素，实可简单归纳为以下两点：其一、是因为他之生于可以集大成之足以有为的时代，其二、是因为他之禀有可以集大成之足以有为的容量。

先从集大成的时代来说，一个诗人与其所生之时代，其关系之密切，正如同植物之与季节与土壤，譬如二月早放之夭桃，十月晚开之残菊，纵然也可以勉强开出几朵小花，而其瘦弱与零丁可想；又如种桑江边，艺橘淮北，纵使是相同的品种根株，却往往会只落得摧折浮海、枳实成空的下场，明白了这个关系，我们就更会深切地感到，以杜甫之天才，而生于足以集大成的唐代，这是何等可值得欣幸的一件事了。自纵的历史性的演进来看，唐代上承魏晋南北朝之后，那正是我国文学史上一段萌发着反省与自觉的重要时期。在这一段时期中，纯文学之批评既已逐渐兴起，而对我国文字之特色的认识与技巧的运用，也已逐渐觉醒。上自

魏文帝之《典论·论文》、陆机之《文赋》，降而至于钟嵘之《诗品》、刘勰之《文心雕龙》，加之以周顒、沈约诸人对四声之讲求研析，这一连串的演进与觉醒，都预示着我国的诗歌，正在步向一个更完美更成熟的新时代。而另一方面，自横的地理性的综合来看，唐代又正是一个糅合南北汉胡各民族之精神与风格而汇为一炉的大时代，南朝的藻丽柔靡、北朝的激昂伉爽，二者的相摩荡，使唐代的诗歌，不仅是平顺地继承了传统而已，而且更融入了一股足以为开创与改革之动力的新鲜的生命。这种糅合与激荡，也预示着我国的诗歌将要步入一个更活泼更开阔的新境界。就在这纵横两方面的继承与影响下，唐代遂成为了我国诗史上的一个集大成的时代。在体式上，它一方面继承了汉魏以来的古诗乐府，使之更得到扩展而有以革新；而另一方面，它又完成了南北朝以来一些新兴的体式，使之益臻于精美而得以确立。在风格上，则更融合了刚柔清浊的南北汉胡诸民族的多方面的长处与特色，而呈现了一片多采多姿的新气象。于是乎，王、孟之五言，高、岑之七古，太白之乐府，龙标之绝句，遂尔纷呈竞美，盛极一时了。然而可惜的是，这些位作者，亦如孟子之论夷、齐、伊尹与柳下惠，虽然都能各得圣之一体，却不免各有所偏，而缺乏兼容并包的一份集大成的容量。他们只是合起来可以表现一个集大成之时代，而却不能单独地以个人而集一个时代之大成，以王、孟之高雅而短于七言，以高、岑之健爽而不擅近体，龙标虽长于七绝，而他体则未能称是，即是号称诗仙的大诗人李太白，其歌行长篇虽有“想落天外，局自变生”之妙，而却因为心中先存有一份“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的成见，贵古贱今，对于“铺陈终始，排比声韵”的作品，便尔非其所长了，所以虽然有着超尘绝世的仙才，然而终未能够成为一位集大成的圣者。看到这些人的互有短长，于是我们就越发感到杜甫兼长并美之集大成的容量之难能可

贵了。

说到杜甫集大成的容量，其形式与内容之多方面的成就，固早已为众所周知，而其所以能有如此集大成之容量的因素，我以为最重要的，乃在于他生而禀有着一种极为难得的健全的才性——那就是他的博大、均衡与正常。杜甫是一位感性与知性兼长并美的诗人，他一方面具有极大且极强的感性，可以深入于他所接触到的任何事物之中，而把握住他所欲攫取的事物之精华；而另一方面，他又有着极清明周至的理性，足以脱出于一切事物的蒙蔽与局限之外，做到博观兼采而无所偏失。这种优越的禀赋，表现于他的诗中，第一点最可注意的成就，便是其汲取之博与途径之正。就诗歌之体式风格方面而言，无论古今长短各种诗歌的体式风格，他都能深入撷取尽得其长，而且不为一体所限，更能融会运用，开创变化，千汇万状，而无所不工。我们看他《戏为六绝句》之论诗，以及与当时诸大诗人，如李白、高适、岑参、王维、孟浩然等，酬赠怀念的诗篇中的论诗的话，都可看到杜甫采择与欣赏的方面之广；而自其《饮中八仙歌》、《醉时歌》、《曲江三章》、《同谷七歌》、《桃竹杖引》等作中，则可见到他对各种诗体运用变化之神奇工妙；又如自其《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及“三吏”、“三别”等五古之作中，则可看到杜甫自汉魏五言古诗变化而出的一种新面貌。而自诗歌之内容方面而言，则杜甫更是无论妍媸钜细，悲欢忧喜，宇宙的一切人情物态，他都能随物赋形，淋漓尽致地收罗笔下而无所不包。如其写青莲居士之“飘然思不群”，写郑虔博士之“樽散鬓成丝”，写空谷佳人之“日暮倚修竹”，写李邓公驰马之“顾影骄嘶”，写东郊瘦马之“骨骼硃兀”，写丑拙则“袖露两肘”，写工丽则“燕子风斜”，写玉华宫之荒寂，则以上声马韵予人以一片沉悲哀响；写洗兵马之欢忭，则以沉雄之气运骈偶之句，写出一片欣奋祝愿之情，其涵蕴之博

与变化之多，都足以为其禀赋之博大均衡与正常的证明。其次一点值得我们注意的，则是杜甫严肃中之幽默与担荷中之欣赏。我尝以为每一位诗人，对于其所面临的悲哀与艰苦，都各有其不同之反应态度，如渊明之任化，太白之腾越，摩诘之禅解，子厚之抑敛，东坡之旷观，六一之遣玩，都各因其才气性情而有所不同，然大别之，不过为对悲苦之消融与逃避。其不然者，则如灵均之怀沙自沉，乃完全为悲苦所击败而毁命丧生。然而杜甫却独能以其健全之才性，表现为面对悲苦的正视与担荷。所以天宝的乱离，在当时一般诗人中，惟杜甫反映者为独多，这正因杜甫独具一份担荷的力量，所以才能使大时代的血泪，都成为了他天才培育的浇灌，而使其有如此强大的担荷之力量的，则端赖他所有的一份幽默与欣赏的余裕。他一方面有极主观的深入的感情，一方面又有极客观的从容的观赏，如其最著名的《北征》一诗，于饱写沿途之人烟萧瑟、所遇被伤、呻吟流血之余，却忽然笔锋一转，竟而写起青云之高兴，幽事之可悦，山果之红如丹砂，黑如点漆，而于归家后，又复于囊空无帛、饥寒凛冽之中，大写其幼女晓妆之一片娇痴之态。又如其《空囊》一诗，于“不爨井晨冻，无衣床夜寒”的艰苦中，竟然还能保有其“囊空恐羞涩，留得一钱看”的诙谐幽默。此外杜甫虽终生过着艰苦的生活，而其诗题中，则往往可见有“戏为”、“戏赠”、“戏简”、“戏作”等字样，凡此种种都说明了杜甫的才性之健全，所以才能有严肃中之幽默与担荷中之欣赏，相反而相成的两方面的表现。这种复杂的综合，正足以为其禀赋之博大均衡与正常的又一证明。

此种优越之禀赋，不仅使杜甫在诗歌的体式、内容与风格方面达到了集大成之多方面的融贯汇合之境界，另外在他的修养与人格方面，也凝成了一种集大成之境界，那就是诗人之感情与世人道德的合一。在我国传统之文学批评中，往往将文艺之价值

依附于道德价值之上，而纯诗人的境界反而往往为人所轻视鄙薄。即以唐代之诗人论，如李贺之锐感，而被人目为鬼才，以义山之深情，而被人指为艳体，以为这种作品“无一言经国，无纤意奖善”（李涪《释怪》）。而另外一方面，那些以“经国”、“奖善”相标榜的作品，则又往往虚浮空泛，只流为口头之说教，而却缺乏一份诗人的锐感深情。即以唐代最著名的两位作者韩昌黎与白乐天而言，昌黎载道之文与乐天讽谕之诗，他们的作品中所有的道德，也往往仅只是出于一种理性的是非善恶之辨而已。而杜甫诗中所流露的道德感则不然，那不是出于理性的是非善恶之辨，而是出于感情的自然深厚之情。是非善恶之辨乃由于向外之寻求，故其所得者浅；深厚自然之情则由于天性之含蕴，故其所有者深。所以昌黎载道之文与乐天讽谕之诗，在千载而下之今日读之，于时移世变之余，就不免会使人感到其中有一些极浅薄无谓的话，而杜甫诗中所表现的忠爱仁厚之情，则仍然是满纸血泪、千古常新，其震撼人心的力量，并未因时间相去之久远而稍为减退，那就因为杜甫诗中所表现的忠爱仁厚之情，自读者看来，固然有合于世人之道德，而在作者杜甫而言，则并非如韩、白之为道德而道德，而是出于诗人之感情的自然之流露。只是杜甫的一份诗人之情，并不像其他一些诗人的狭隘与病态，而乃是极为均衡正常，极为深厚博大的一种人性之至情。这种诗人之感情与世人之道德相合一的境界，在诗人中最为难得，而杜甫此种感情上的健全醇厚之集大成的表现，与他在诗歌上的博采开新的集大成的成就，以及他的严肃与幽默的两方面的相反相成的担荷力量，正同出于一个因素，那就是他所禀赋的一种博大均衡而正常的健全的才性。

以杜甫之集大成的天才之禀赋，而又生于可以集大成的唐朝的时代，这种不世的际遇，造成了杜甫多方面的伟大的成就。而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则该是他的继承传统而又能突破传统的，一